

明朝前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 移民活动及其社会作用初探

孙冬虎 刘文革

(河北师范大学)

提 要: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过多次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本文初步探讨了它们的社会背景、迁移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论述了人口迁移在稳定社会局势、恢复农业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

主题词: 人口迁移(移民) 社会

明朝前期(洪武—永乐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公元1368年,明政权确立,取代了元朝的统治。由于连年战争,我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破坏,成千上万的饥民流离失所。残酷的杀戮和饥疫流行,致使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当时,太行山东的北平、河南、山东“多是无人之地”¹⁾。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等率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²⁾。山西北部大同等地,“元季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³⁾。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尤其是农业经济的残败,给刚刚建立的明政权造成了严重困难。封建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村,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耕作,农业生产就得不到恢复。加上大批守边部队的军需,都依赖于从江南调运,使明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影响了政权的巩固和封建经济的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明朝政府依据宽猛适中的策略思想,效法汉唐前期与民休息的政策,采取了一些刺激农业生产回升的措施。朱元璋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⁴⁾。战争期间,有大量无主荒地没人耕种。于是,政府招抚流亡的贫民回乡,按劳动力数目拨给他们附近的荒田耕种,并以垦田多少作为考核官吏任职优劣的标准之一。修复水利工程,在严重受灾的地方减免租税,都起到了稳定社会局势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为调剂劳动力的分布状况,加紧开发华北平原的土地资源,恢复农业经济,在黄河中下游各省,明政府强制性地展开了规模浩大的移民活动。

一、持续不断的人口迁移

(一) 加强北平防务和拱卫京师并重的洪武年间人口迁移

本文1985年11月27日收到,1986年9月10日第一次修改,1987年3月10日第二次修改。

1) 顾炎武:《日知录》,卷10,〔开垦荒地〕。

2) 《明太祖实录》,卷33。

3) 《明太祖实录》,卷61。

4) 《明太祖实录》,卷34。

明朝初创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迁移，大都是在军事行动裹胁下进行的。洪武四年三月，“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计户万七千二百七十四，口九万三千八百七十八”¹⁾。六月，“徙北平山后（指今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两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隅）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一十九万七千二百七口，散处诸卫府。籍为军者给衣粮，籍为民者给田以耕”。“又以沙漠遗民（指为明军收降的元朝势力北走后遗留下来的军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屯田北平府管内之地，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开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²⁾。五年七月，“革奶川、宜兴、兴、云四州，徙其民于北平附近州县屯田”³⁾。长城附近的贫民迁到北平周围屯田耕种，为国家增添了租税收入。大量人口的流入，也有助于当时最迫切的北平防务问题的解决。

战争使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锐减，某些受破坏较轻的地方，相对成为所谓“狭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调整土地关系，人口势必自狭乡迁往宽乡。山西南部地区，自然灾害虽不可免，但这里是元末名将扩廓帖木儿的根据地，东有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相隔，西南两而被黄河这一天然屏障环绕，受兵火涂毒比其它地方轻得多。较之太行山东地区，汾水、沁水流域人口就显得稠密了。明朝统治渐趋稳定，愈益显出调剂劳动力地区分布的必要性。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部分采纳了这一建议，“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⁴⁾次年十月，“徙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⁵⁾由此揭开了明朝前期自山西南部向华北平原迁移人口的序幕。在这之后，为加速垦荒地的开垦，还在省内各府之间作人口调整。在山东，经过洪武年间二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登、莱、青、兖、济南各府人烟日稠，东昌府周围却仍嫌地旷民稀。洪武二十五年二月，政府“徙山东登、莱二府贫民无恒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就耕于东昌”。⁶⁾二十八年二月，再次向东昌移民，到七月，“青、兖、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一千五十一户，四千六百六十六口”⁷⁾。

洪武年间国都在南京，安徽凤阳又是朱元璋的故乡，因此，曾将黄河中下游各省的部分贫民迁到此，借以拱卫京师。洪武六年九月，徙山西北部诸州县贫民八千三百三十八户，三万九千余口到凤阳（时称中立府）⁸⁾。九年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业者于凤阳屯田”⁹⁾。二十二年四月，“命户部起山东流民居京师”¹⁰⁾。这几次人口迁移，为凤阳和南京战乱之后的人口回升，作了有效的补充。

1) 《明太祖实录》，卷62。

2) 《明太祖实录》，卷66。

3) 《明太祖实录》，卷75。

4) 《明太祖实录》，卷193。

5) 《明会要》，卷50。

6) 《明太祖实录》，卷216。

7) 《明太祖实录》，卷239。

8)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35。

9) 《明太祖实录》，卷116。

10) 《明太祖实录》，卷196。

（二）永乐年间山西和南方诸省人口大量迁入北京

朱元璋死后不久，燕王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历时四年的战争过后，“淮以北鞠为茂草”¹⁾。明成祖继续实行移民屯垦的政策，饱受战乱之苦的华北平原才逐渐恢复了生机。

永乐年间，政府依然从山西大量移民到太行山东，尤其是北京及其周围地区。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时成祖已即位），“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²⁾。永乐元年三月，将山西泽、潞等州县无田之家分丁到河南裕州耕种³⁾。二年九月和三年九月，两次分别“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⁴⁾。五年五月，“命户部徙山西之平阳、泽、潞，山东之登、莱等府州民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⁵⁾。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安州”⁶⁾。

南方各省是向北京地区移民的另一重要来源。永乐元年八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⁷⁾。此外，“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⁸⁾。这些移民活动贯穿于经济恢复过程中，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

除了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各地自发性的人口流动也时有发生。在战争或灾疫流行期间，尤其是这样。战乱平息及灾疫缓解后，流民一般仍回原籍开荒种田，在故地重建家园，也有的从此在他乡立足。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自发的人口迁移活动。洪武三十五年八月，“直隶淮安及北平、永平、河间诸郡，避兵流移复业者凡七万一千三百余户”⁹⁾。永乐元年五月，“顺天八府所属见在人户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未复业八万五千有奇”¹⁰⁾。可见动乱年月人口自发迁移之一斑。明政府还会将一些军队削去军籍转为平民，到原籍或别的地方开荒耕种。如，“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户部尚书堂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奏，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垛集”，因青壮年从军或战死，导致“民人衰耗，甚至户绝，田土荒芜。今宜令在任者籍记其名，放还耕种，俟有警急，仍复征用，其幼小记录者，乞削其军籍。俾应民差”¹¹⁾。有军务则保疆守土，和平时则为民垦，人口在军营和农村之间

1) 《明史》，卷77，〔食货一〕。

2) 《明太宗实录》，卷12下。

3) 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8。

4) 《明太宗实录》，卷34，46。

5) 《明太宗实录》，卷67。

6) 《明太宗实录》，卷182。

7) 《大明会典》，卷19。

8) 《明史》卷77，〔食货一〕。

9) 《明太宗实录》，卷11。

10) 《明太宗实录》，卷20下。

11) 《明太宗实录》，卷15。

往复移动，促进了荒地的开垦。

（三）赐钞免税保证了贫民迁移

洪永年间的数次移民，是采取强制措施调节人口分布的结果。由黄河中下游各省迁往南京、凤阳，或者自浙江一带迁入北京，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路途遥远，贫民的艰辛可想而知。人口迁出最多的山西南部州县，不论沿汾河谷地北上，还是穿越山岭东进，最终都要经过太行山的隘道才能到达目的地。为实现移民计划，明政府采取了支付一定的路费、粮食，派舟车运送、减免税收等辅助性方法，以刺激贫民的迁移。洪武四年，“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征，三年后亩收租一斗”。¹⁾二十一年八月，迁山西贫民到太行山东时，“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²⁾。次年四月，令山东流民居京师，“人赐钞二十锭，俾营生业”³⁾。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命户部以耕牛一万头给东昌府屯田贫民”⁴⁾。永乐年间，明政府继承了这些作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迁山西贫民入北平各府州县时，“仍户给钞，使置牛具、子种，五年后征其税”⁵⁾。永乐五年五月自山西、山东迁民到北平，“户给路费钞一百锭，口粮六斗”⁶⁾。十四年十一月，对由山东、山西、湖广迁入保安州的贫民，“免赋役三年”⁷⁾。上述措施多少缓解了被迫远迁他乡的民众的痛苦。人口迁移对恢复国家经济有重要意义，但对那些迁出的贫民而言，离乡背井的遗恨却是难以泯灭的。

二、人口迁移的社会作用

（一）人口迁移增强了社会的政治安定

洪永年间的人口迁移，是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政治中心的转移，制约着人口迁移的方向。洪武年间向北平附近移民，偏重于加强其军事防御力量。这样，在由山西向太行山东地区移民时，又曾把河南、山东及真定的部分贫民迁到南京和凤阳。永乐年间，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使之兼有华北军事重镇和全国政治中心的双重职能。北京是明成祖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作为首都，它的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⁸⁾。完全符合统治者“控四夷，制天下”的政治需要。但是，作为“靖难之役”的大后方，在持续数年的战争中，北京人口的损耗也是不难想象的。

1) 《明史》卷77,〔食货一〕

2) 《明太祖实录》，卷193。

3) 《明太祖实录》，卷196。

4) 《明太祖实录》，卷236。

5) 《明太宗实录》，卷12下。

6) 《明太宗实录》，卷67。

7) 《明太宗实录》，卷182。

8)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形胜〕。

为营建北京城,不得不从受害稍浅的山西大量迁民充实北京及其附近的农村,以改变市井萧条、田园荒芜的状况。所以,在永乐年间几次大规模移民活动中,山西依然是人口的净输出区,而输入区几乎都集中在北京及其周围各州县。不仅如此,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北京、永平、遵化等处壤地肥沃,人民稀少,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¹⁾千方百计搜罗人口到北京周围垦田。由于政治中心的北移,一改洪武年间黄河中下游各省部分人口南流的趋向,从浙江等地大规模迁富户到北京,既增加了首都地区的人口,又使江南地方豪绅脱离了盘踞多年的根据地,限制了他们对土地的兼并,使自耕农获得的土地不致丧失。大量自耕农的存在,又是明朝社会安定所不可缺少的条件。顾炎武说,“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²⁾。因此,移民屯垦有利于明政权实现长治久安设想。

(二) 人口迁移加速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

明朝前期的多次移民活动,都是面对百孔千疮的战争残局,急于恢复农业经济,历史为他们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先例。农业状况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人口——特别是成年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尤其突出。一般说来,社会相对安定的年代,人口增长比较迅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土地的开发利用准备了必要条件,农业经济日渐上升,在一定时期内,可望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相反,则往往使人口剧减,农业的衰落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状况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寒暑表。当人口数量尚未超越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土地承载能力时,人口的增减则是农业兴衰的反光镜。历史上重大的人口迁移,都曾经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迁入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我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战乱为导火线引起的北方人口自发性南迁的过程。明朝前期的移民活动,在数量、范围及社会作用等方面,自然不能与它们相提并论,但明朝以历史为借鉴,将人口迁移变为政府主动采取的积极手段,从而消除了移民过程中的盲目性,收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良好效果。

元末旷日持久的战争,使“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死亡流离,遍于道路”³⁾,许多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⁴⁾。经过洪武年间三十年的经营,黄河中下游各省的人口损耗得到了某些补偿,并呈现出增长趋势。北平、河南、山东、山西四省总人口在洪武十四年恢复到13011709人,洪武二十六年为13167190人,各省所占本区总人口的比重未变,人口密度略有增大(见下表)。

劳动力的增多带来了经济复苏,为明朝提供了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洪武二十六年,上述四省交纳的夏秋税粮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⁵⁾,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产地。从前人烟稀少的地区变化更加显著。洪武二十八年,“东昌等三府屯田,迁民五万八千余户,租三百二十

1) 《明太宗实录》,卷22。

2)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人聚〕。

3)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推算。

4) 《明太祖实录》,卷243。

5) 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推算。

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状况表*

Population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省区	年份 人口状况	洪 武 十 四 年			洪 武 二 十 六 年		
		人 数	占本区人口 比重 (%)	人口密度 (人/公里 ²)	人 数	占本区人口 比重 (%)	人口密度 (人/公里 ²)
北 平		1893403	14.6	13.94	1926595	14.6	14.23
河 南		1891087	14.5	12.86	1912542	14.5	13.00
山 东		5196715	39.9	39.11	5255876	39.9	39.57
山 西		4030454	31	27.54	4072127	31	27.81

* 据梁方仲资料推算。

二方五千九百余石，棉花二百八十四万斤”。“彰德等四府屯田，凡三百八十一屯，租二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余石，棉花五百二万五千余斤”¹⁾。靖难之役使经济恢复的势头受到阻滞，并出现了饥民暴骨原野的萧条状况，导致永乐年间向北京附近大规模移民。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将明朝推进到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永乐年间，“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丝钞等二千余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羨，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²⁾。剔除其中包含的溢美之词，依然可以认为，洪永年间的人口迁移，不失为缓解北方农民土地问题，恢复农业经济的得宜之举。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是构成整个封建经济网络的基本链环。移民活动造就了大批自耕农，保证了国家的各种赋税、徭役有足够的承担者。农业的兴盛又带动了北京等城市商业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等级的贸易中心，从而使支撑着封建国家大厦的经济基础更加巩固。

(三) 人口迁移促进了各地的文化交流

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促使人们跨越了自然条件造成的种种障碍，从不同地区聚集到一起，加强了黄河中下游各省之间，尤其是太行山东诸省与山西之间的联系，带动了南方和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他们各自吸收对方的技艺、习俗、语言，推进了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发展。由山西迁到太行山以东地区的人们，用故乡的地名命名自己的新居住地，如北京顺义县的绛州营、红铜（洪洞）营等，就是移民的痕迹，标志着当地早期居民与山西的渊源关系。有许多乡村，类似永乐年间某姓人由山西迁来建村的说法，在方志、碑刻、家谱中时有所见，即使远至渤海沿岸也是如此。如河北盐山县与孟村回族自治县，称永乐年间由山西迁来建村的有168个自然村，占两县村庄总数的31.5%³⁾。当然，由于志书和家谱的修纂时间距明初移民已相当遥远，县以下的乡村更是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居民的来源真伪难辨，出于某种心理作用而穿凿附会并夸大事实的成分必定难免，它们的可信程度也就值得推敲了。以移民活动为背景的传说，经过多年的口头加工，与信史相差越来越远，尽管如此，来自山

1) 《明太祖实录》，卷243。

2) 《明史》，卷78，〔食货二〕。

3) 据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编：《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1982）和孟村回族自治县地名办公室编：《孟村地名初考》（1982）统计。

西和南方诸省的人们，在洪永年间开发华北平原的历史贡献，还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综上所述，在传统农业阶段，劳动力的数量决定着农业生产的荣枯。元末混战及明代靖难之役过后，黄河中下游地区两度呈现人口锐减、农业萎缩。有所作为的统治者采取措施刺激人口增长和经济恢复，移民屯垦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战争的冲击使人口的地理分布存在着重新调整的必要。山西是元末蒙古贵族势力同明朝相抗衡的根据地，从这里大量迁民，当然不能完全排除明政府对这里的人们施行报复的因素。洪永年间半个世纪的经营，赢得了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北京一直是华北的屏障，扼塞外进入中原的咽喉。大规模移民使这一军事重镇有了比较稳固的经济依托。防御力量的增强，保障了各项政治、经济计划的实施。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直接影响着人口迁移的方向。政治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双重职能，使北京成为人口输入最多的地方。山西及南方人口连续迁入华北平原，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而且加速了各省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移民活动本身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客观上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80年。
- 〔2〕 尹钧科：明代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 〔3〕 王有业：论明初自耕农的大量存在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6期，1981年。

《地理研究》下期要目预告

- 黄秉维：华南坡地利用与改良：重要性及可行性
- 陆中臣等：试论黄河北岸可能决口地段及其最大淹没范围
- 闵秋宝：淀山湖太湖形成的古生物证据
- 王守春：《水经注》塔里木盆地“南河”考辨
- 赵英时：华北平原12万年以来的古气候变化
- 刘亚传等：我国沙漠地区潜水氟的地理分布、成因、迁移演变
- 相远东：多年平均陆面平均蒸发量的计算
- 任国玉：美国中东部温带稳定 $\geq 10^{\circ}\text{C}$ 积温
- 王绍武：大气中 CO_2 浓度增加对气候的影响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IGRATIONS AND
THEIR SOCIAL EFFECTS IN THE DISTRICT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Sun Donghu Liu Wenzha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ubject Indexing: Migration Social

Abstract

During the years of Hong Wu and Yongl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re appeared several largescaled, organized migrations along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m, the process and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such migrations. It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Each migr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Ming Dynasty is the result of one of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rulers to prevent the economy depressed by war from decline. The removal of the country's political center (i.e. the removal of capit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greatly diverts the migrations. Such changes stabilized the society then, quickening the step of the economic blooming and flourishing, and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intercourse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several provinces along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Especially the large scaled migrations from the area around Shanxi province into Beijing greatly balanced the population, and solidified Beijing's position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military superiority.